



[美] 塞缪尔·亨廷顿 劳伦斯·哈里森 主编

CHAP. BOY

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文化的重要作用

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

Samuel P. Huntington and Lawrence E. Harrison

一部探讨文化因素对经济和政治发展影响的经典之作
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威廉·尤利乌斯·威尔森
和丹尼尔·贝尔 联袂推荐

新华出版社



[美] 塞缪尔·亨廷顿 劳伦斯·哈里森 主编

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文化的重要作用

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

Samuel P. Huntington and Lawrence E. Harrison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新版 / (美) 亨廷顿，(美) 哈里森主编；程克雄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11

ISBN 978-7-5166-0167-9

I. ①文… II. ①亨… ②哈… ③程… III. ①文化人类学—研究 IV. ①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8379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9-6749 号

Culture Matters

Copyright © 2000 by Lawrence E. Harrison and Samuel P. Huntington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1 by Xinhua Publishing Corporation (Xinhua Chu Ban Sh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c Books, a Subsidiary of Perseus Books LLC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

编 者：〔美〕塞缪尔·亨廷顿 劳伦斯·哈里森

出版人：张百新

译 者：程克雄

责任编辑：贾晓伟 唐波勇

封面设计：肖东

责任印制：廖成华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a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mm×240mm

印 张：23.5

字 数：380 千字

版 次：2013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2013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0167-9

定 价：56.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目录

CONTENTS

1/编者序言

7/前言

文化的作用

塞缪尔·亨廷顿

17/本书撰稿人简介

25/绪论

文化为什么重要

劳伦斯·哈里森

第一部分 文化与经济发展

第1章

47/文化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

戴维·兰德斯

第2章

60/态度，价值观，信念以及繁荣的微观经济学

迈克尔·波特

第3章

74/对新的经济发展社会学的几点看法

杰弗里·萨克斯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目录

CONTENTS

CULTURE MATTERS

第 4 章

经济发展的文化分类/88

马里亚诺·格龙多纳

第 5 章

拉丁美洲：文化与精英行为/100

卡洛斯·阿尔韦托·蒙塔内尔

第 6 章

非洲需要一个文化调整计划吗？/109

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

第二部分 文化与政治发展

第 7 章

文化与民主/125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

第 8 章

社会资本/143

弗朗西斯·福山

第 9 章

腐败，文化及市场/158

西摩·马丁·利普塞特 加布里埃尔·萨曼·伦兹

目录

CONTENTS

第三部分 人类学家的辩论

第 10 章

175/传统信念与习俗：是否有一些比另一些好？

罗伯特·埃杰顿

第 11 章

190/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文化，儿童及进步

托马斯·韦斯纳

第 12 章

208/道义地图，“第一世界”的自吹自擂，及新福音传道者

理查德·施韦德

第四部分 文化与性别

第 13 章

233/文化，性别和人权

芭芭拉·克罗西特

第 14 章

244/拉丁美洲的文化，制度与男女不平等

玛拉·赫滕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目录

CONTENTS

CULTURE MATTERS

第五部分 文化与美国少数民族

第 15 章

认真对待文化：架构及非洲裔美国人实例 / 257

奥尔兰多·帕特森

第 16 章

解构文化 / 277

内森·格莱泽

第六部分 亚洲危机

第 17 章

法律，家族联系及亚洲经商方式 / 291

德怀特·珀金斯

第 18 章

“亚洲价值观”：从狄纳莫到多米诺？ / 302

卢西恩·派伊

第 19 章

多重现代性：东亚现代性涵义初步探讨 / 314

杜维明

目录

CONTENTS

第七部分 促进变革

第 20 章

327/改变国民的心态：致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

迈克尔·费尔班克斯

第 21 章

343/文化，心理模式和国家繁荣

斯特斯·林赛

第 22 章

356/促进社会进步的文化变革

劳伦斯·哈里森

369/译后记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编者序言

《常青藤译丛》是本社推出的一套思想文化类丛书。其名称和主旨皆受到以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为主体的 league 的启发。这是一个在世界范围享有崇高学术盛名的联盟，该联盟致力于“树立标准、展示理想、坚持价值”。具体说来，多年来，它以追求理想的激情和探索现实的精神，坚持不懈地探求新思想、新事物、新价值，倡导自由探索、自由审视和自由创造。

《常青藤译丛》是一套力图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以全球性的眼光推介外国前沿思想文化成果的丛书。我们将分辑出版，陆续为读者推出。第一辑共四本，它们是《敲开智者的脑袋——当代西方 50 位著名思想家的智慧人生》〔英〕约翰·雷契著、《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美〕劳伦斯·哈里森、塞缪尔·亨廷顿主编、《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德〕哈拉尔德·米勒著、《学术责任》〔美〕唐纳德·肯尼迪。第二辑共四本：《总统政治——从约翰·亚当斯到比尔·克林顿的领导艺术》（〔美〕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著）、《创新性思维——实现核心价值的决策模式》（〔美〕拉尔夫·L·基尼著）、《公民与国家》（〔美〕菲利克斯·格罗斯著）、《世界文明史——观察世界的新视角》（〔美〕威廉·麦克高希著）。第三辑：《人类思想的主要观点——形成世界的观念》（上、中、下）（英）肯尼思·麦克利什主编、《哲学的社会学——一种全球化学术变迁理念》（上、下）（美）R·柯林斯著、《多样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构建与商业体制的变迁》（英）理查德·惠特利著。

本社自推出《常青藤译丛》三辑之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特别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学术责任》既提供了一个学术规范，又为中国学术腐败现象起到了警示作用。《创新性思维》使你的“决策”占领先机，它从高层次来考察人与世界的关系，被认为是具有 21 世纪科学发展特征的新复杂性科学。《敲开智者的脑袋》的出版，提供了前沿性的文化思想资源，促进了我国哲学界关于从“符号学”、“结构主义”到“后现代性”的研究。《总统政治》、《公民与国家》与

《文化的重要作用》构成了“国际问题”系列模块。《总统政治》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了美国总统与国际问题的内在关系。《文化的重要作用》、《哲学的社会学》、《人类思想的主要观点》从“文化”的角度，哲学的高度探讨了文化对世界经济、文化转型、社会发展、国际政治的重要性影响。著名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格罗索斯在《公民与国家》一书中，研究了诸如多民族国家的边缘社会群体、族属身份、本土文化、政治多样性，以及国家起源和国家赖以建立的基本纽带等相关问题。他以全球性的视野重新审视了与国际问题相关的民族、公民和国家等学科范畴。《世界文明史》、《文明的共存》与我社《文明的冲突》构成了“文明”系列模块。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与米勒的“文明共存论”形成了同一命题的合题，两人的观点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了热点话题。“文明的二重性”在我国学术界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广泛的关注和深刻的反思。《世界文明史》，提供了在传媒时代观察世界的新视角。作者在论证了以汤因比为代表人物的各主要历史文明学派与“四大文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计算机技术所带来的“第五大文明”。

《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是世界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思想家塞缪尔·亨廷顿和劳伦斯共同主编的一部著作，共24位撰稿人，其中有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他们都是在相关领域负有盛名的世界级专家：中国历史与哲学教授、《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的作者杜维明，公共政策学教授、《历史的终结》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经济历史学家、《国富国穷》的作者戴维·兰德斯，哈佛国际与地区问题高级研究员、驻联合国首席记者、曾驻东南亚和南亚的记者克罗西特·芭芭拉，非洲研究、开发和管理协会会长、非洲人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曾任美国国际开发署驻拉丁美洲五个国家负责人的劳伦斯·哈里森，著名国际政治问题专家、《文明的冲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的作者塞缪尔·亨廷顿……

专家学者们为文化问题的研究带来了重要的成果和多样的视角。

理查德·施韦德坚持文化多元论，反对第一世界绘制道义地图，在全世界推行其“先进文化”和“新秩序”。罗伯特·埃杰顿认为文化有一定的适应性，但永远不可能“尽善尽美”。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描述了非洲的落后文化如何造成了非洲的困境，认为非洲的价值观、道德观、教育等亟待调整和变革。而流亡的古巴人、西班牙文专栏作者卡洛斯·阿尔韦托·蒙塔内尔则考察了拉丁美洲

的状况，认为拉丁美洲的政客、军人、企业家、教会人士等不尊重法律、不遵循民主，他们落后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是阻碍拉丁美洲发展的主要原因。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加布里埃尔·萨曼·伦兹通过研究各个国家的腐败指数发现，腐败指数是随着文化界限而变更的，拉丁美洲、非洲等地区腐败指数最高。而一些学者认为儒家文化和价值观是亚洲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例如“任人唯亲”阻碍了企业的民主化，并且“关系网”和“先苦后甜”、“长远处着眼”的文化特性使他们不注重短期内企业是否盈利，而是力争扩大市场份额，以期日后的巨大回报，“但这种预期报偿也许是最大的灾难”。

本书从文化与经济发展、文化与政治发展、文化与性别、文化与美国少数民族、亚洲和促进变革等几个方面论证并阐述了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回答了文化价值观是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的。由埃通加·曼格尔在书中提出的一个命题，“文化是制度之母”可以说是本书点睛之笔。

《敲开智者的脑袋——当代西方50位著名思想家的智慧人生》是关于从结构主义到后现代性理论的一本书。作者约翰·雷契在书中介绍了当代极具影响力的50位著名思想家。其中包括尼采、弗洛伊德、德里达、利奥塔和卡夫卡等人。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各个时期思想理论及其影响，作者特地在每部分前写有一个简短的导言性评述。此书不仅是理解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重要参考，而且对于希望更多了解本世纪最重要的知识革命的读者来说是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的作者哈拉尔德·米勒是一位极具权威的批评家。他不仅针锋相对地反驳了亨氏文明敌对论的全球观，而且向我们警示，简单地渲染或者接受这种片面的世界观或敌对论是极其危险的。作者明确指出：不是文化的对抗，而是文化的共存与对话；国际社会必须更多地尝试进行合作，而不是简单地对抗；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不仅应该保持，而且应善加利用。只有对各种文化表现出宽容，全球的和平共存才可能得以实现。虽然国际现实政治的发展似乎证明了亨廷顿理论的某种预见性，但哈拉尔德·米勒的理论仍然具有现实价值。我们不妨将塞缪尔·亨廷顿和哈拉尔德·米勒的看似对立的理论观点看作同一命题的合题——这样两位思想家就在智性和善性的目的上汇合了。

美国学者亨廷顿和德国学者米勒从“文明冲突”和“文明共存”的视角考察当今世界的大趋势，提出了文明分析的世界框架，引起了世界范围的讨论、关注

和反思。“文明冲突”是文明发展演进的动力，文明共存是融合各种文明不同的特质、扬弃不合时宜，形成多样化的新的文明体系。文明共存中必然有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中包含着文明的共存和融合。文明在产生同一性的同时也必将产生多元性，两者密不可分并互为前提，是辩证统一在一起的。历史上每一次文明冲突的结果往往是进一步形成文明共存与融合，而每一次经过文明共存与融合产生的新的文明又会孕育着更为深刻的文明冲突。文明冲突和文明共存引发世界文明的变迁、演进、发展和多样化，不同文明在交融中发生碰撞而走向整合。

《学术责任》的作者在斯坦福大学做过多年校长。现在仍在该校执教的唐纳德·肯尼迪无疑是著述此书的最佳人选。他以学者和大学校长的双重身份，从学术责任的高度首先阐述了如何影响未来大学，如何恢复大学使命和忠诚的价值观的问题；其次，作者论述了大学至高无上之处在于给人类提供改良文化、创造文化、延续生命和保障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智力平台。难道世界上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吗？

《总统政治》从约翰·亚当斯到比尔·克林顿，以大量的个案着重论述领导艺术、政治策略和“总统作为政治变革推动者”的重要观点。作者根据每位总统的个性气质、知识结构和家庭背景探究总统的动力来源。以大量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说明，美国的生存发展、社会变革、文化转型、经济繁荣和世界性的地位都与总统政治休戚相关。与此同时，本书也论述了一些总统的花边新闻和拙劣的政治技巧。所谓的“总统政治”，就是“总统创造的政治”。

《创新性思维——实现核心价值的决策模式》的作者曾与霍华德·雷法合著《多重目标决策》，该书获美国“兰切斯特奖”。他的专著《创造性思维》在美国获“决策分析最佳著作奖”。本书是一部既充满灵感，读来又令人振奋的著述，在众多学术著作和商业教科书中本书的观点另辟蹊径：回答了如何把握有关决策的潜在机遇，如何使一项“决策”具有“重大的价值”，如何“创新性”地运用“思维”等重大问题。创新性思维是从更高层次来考察世界的联系。创新性思维方法被认为是预示了21世纪科学发展特征的新的复杂性科学。

《公民与国家》是作者历经半个世纪的思考和研究写出的一部名著。本书集中讨论了国家起源、国家赖于建立的基本纽带和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文化和政治多样性问题。著名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格罗斯认为，民族归属是国际关系中的关键，民族主义是导致冲突的根源，民族问题已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政治秩

序中的主要问题。“民族与国家”的问题是古老而又现代的永恒问题。它既是关于战争、民族冲突、种族屠杀的悲惨记忆，又是具有不同文化、不同民族背景的世界各国人民对世界和平的期盼和共同发展的不懈追求。不同的民族、部落、宗教集团和种族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和睦相处并共同发展？带着这样双重的历史和经历，带着这样一个对现在和未来都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作者从全球化时代多民族国家本质出发，以丰富的人类学研究经验，以独特的边缘社会群体为研究对象，对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重新审视了当代民族关系、民族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以及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世界文明史——观察世界的新视角》的最可贵之处在于，使人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认识文明的兴起和消亡。著名的历史学家麦克高希在这里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技术”的概念和“世界五大文明”的学说，并追寻这“五大文明史”的发展轨迹，全面阐述了长达 5000 多年的世界文明史的演变。作者着眼于有历史性的纵向视野和全球化的横向视野，以“传媒技术”的发展为前提、以“文化变革”为线索、以“历史维度”为依据，把世界文明史分为五个阶段，这是作者重新认识与划分“世界文明史”的独到之处。本书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研究与分析从汤因比到各大历史文明学派理论观点。第二部分阐述并论证“四大文明”发展规律。第三部分重点介绍了第五大文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过程和未来展望。

《人类思想的主要观点——形成世界的观念》的主编是世界著名作家、翻译家和评论家，有著作 50 多部。他组织世界上 35 位不同学科的知名学者和专家结集介绍人类思想史上的主要观点，准确解释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重要概念。全书共有 2500 个词条，从早期人类文明到当代计算机技术的最新领域都有诠释。诸多词条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著名学者的不同学术观点。本书几乎涵盖人类文明的所有领域——历史、政治、经济、科学、宗教、哲学、社会学及文学艺术，各种思想越穿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是一本具有重要价值的工具书。

《哲学的社会学——一种全球化的学术变迁理论》是一部在全世界范围内影响极大的著作。该书展示了丰富的人文社会科学内涵，在 1999 年，荣获美国社会学协会杰出学术著作奖。作者 R·柯林斯是世界著名的哲学社会学家，他站在哲学的高度，立足于全球化的视野，追溯古代希腊、中国、日本、印度，以及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和现代欧洲的哲学思潮，提炼出了一种全球化的学术变迁理论。

这一理论既避免把观念仅仅还原为社会的影响，又避免还原为偶然的本土意义的建构，作者尤为关注的是人类思想得以形成的社会定位。

《多样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构建与商业体制的变迁》是一本十分有价值的著作。著名的社会学家理查德·惠特利运用社会学、文化学和人类学的建构理论，通过对 20 世纪末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的研究与比较分析，区分了 6 种商业体制类型，提出了不同于欧洲与美国模式的新型资本主义概念，展示了资本主义的多样性特征，构建了全球化的社会制度与商业的变迁理论。

如果说，人类思想文化是智慧的结晶、进步的阶梯、文明的象征，那么上述多部著作就成为反映当代思想文化深度和成果的最好文本。

《文化的重要作用》由我社翻译出版后，很快多次重印，哲学界、文化学界、历史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有关专家学者及读者对该书宏大的主题、深邃的思想予以了充分的肯定，《读书》、《参考消息》等多家报刊发表了多篇书评以及对原作者的访谈文章。此次再版，我社请校译者对译文的字句做了更为准确的修订，重新推敲译名，订正若干译文，并重新设计了封面和版式。

文化和思想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德谟克里特说：智慧生出三种果实：善于思想、善于说话、善于行动。告别了 20 世纪和经历了 20 余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历史和现实给我们提出了更深层的课题，为了实现中国在新世纪的伟大复兴，一方面我们固然需要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与此同时，还要从多类文化的宝库汲取思想文化的营养——这就是编辑出版《常青藤译丛》之目的。

编者

2009 年 10 月 8 日

■前 言

文化的作用

塞缪尔·亨廷顿

20世纪90年代初，我碰巧浏览了加纳和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经济统计数据，惊讶地发现两国当时的经济水平何其相似：它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致相等。在经济构成方面，初级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所占的比例彼此相近；绝大部分的出口是初级产品，韩国当时仅生产为数不多的若干工业制成品。它们接受的经济援助水平也差不多相等。30年后，韩国成了一个工业巨人，经济名列世界第14位，拥有一些跨国公司，大量出口汽车、电子设备及其他高级制成品，人均收入接近希腊的水平。此外，它在巩固民主体制方面取得长足进展。加纳却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韩国的1/14。发展快慢相差如此悬殊，能作何解释呢？无疑，这当中有多种因素，然而在我看来，文化应是一重要原因。韩国人珍视节俭、投资、勤奋、教育、组织和纪律。加纳人的价值观则有所不同。简而言之，文化在起作用。

另一些学者在90年代初也得出同样的结论。这反映出一个重大的事态发展，即社会科学界重新对文化大感兴趣。早先，在40年代和50年代，曾有不少学者重视文化因素，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各种社会，分析它们之间的差别，解释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状况。当时有关的学者包括玛格丽特·米德，鲁思·本尼迪克特，戴维·麦克莱兰，爱德华·班菲尔德，亚历克斯·英克尔斯，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尔巴，卢西恩·派伊和西摩·马丁·利普塞特等人。这批学者著述甚丰。然而，在其后的60年代和70年代，学术界对文化的研究一度显著减少。到了80年代，对文化这一变数的兴趣开始回升。此时，最引人注目和最有争议的一部早期著作，是劳伦斯·哈里森——一位前美国国际开发署官员——撰写的《不发达是一种心态——拉丁美洲事例》，1985年由哈佛国际事务

研究中心出版。此书以彼此对应的个案研究表明，在多数拉美国家，文化成为发展的一大障碍。哈里森的分析引起了经济学界、欧美拉美问题专家和拉美知识分子的一场抗议风暴。可是，几年之后，这几个方面的人士大都开始看到他的论断有道理。

这时，社会科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转向文化因素，用它解释各国的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军事战略、种族和民族群体的行为以及国与国之间的联合和对抗。为本书撰文的学者当中，多数人都在这一文化复兴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取得了成就，而引起的反应之一是出现了贬低文化作用的反动向，它象征性地和明显地表现在《经济学家》周刊 1996 年 12 月刊载的一篇文章里，这篇文章以高度怀疑的态度评论了弗朗西斯·福山、劳伦斯·哈里森、罗伯特·卡普兰、西摩·马丁·利普塞特、罗伯特·普特兰、托马斯·索厄尔以及鄙人的近著。就这样，在学术界展开了一场论战，一方认为文化是影响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的一个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另一方则坚持一些普遍适用的解释。例如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物质上的自我利益是决定因素，有些政治学家主张“理性选择”论，有些国际关系学者主张新现实主义。读者会发现本书中也包含若干此类观点，因为本书有意要收纳与书名主旨不同的意见。

关于文化在人世间的地位，最明智的说法或许就是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两句话：“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为了探讨莫伊尼汉所说的这两条真理的正确，哈佛国际与地区问题学会在劳伦斯·哈里森的主持下，组织了这一研究课题，本书即是主要的但并非唯一的研究成果。要回答的问题是：文化因素对经济和政治发展能影响到何种程度？如果有影响，又该如何消除或改变文化对于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障碍，以促进进步？

为回答这些问题，首先有必要界定我们所讨论的名词的含义。本书副题中的“人类进步”是指走向经济发展和物质福利、社会一经济公正及政治民主。而“文化”一词，在不同的学科中和不同的背景之下，自然有着多重的含义。它常常用来指一个社会的知识、音乐、艺术和文学成品，即社会的“高文化”。有些人类学家，尤其是克利福德·格尔茨，强调文化具有“深厚意蕴”，用它来指一个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包括它的价值观、习俗、象征、体制及人际关系等等。

然而，在本书中，我们关心的是文化如何影响社会发展；文化若是无所不包，就什么也说明不了。因此，我们是从纯主观的角度界定文化的含义，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

本书所探讨的，是这种主观意义上的文化如何影响到各个社会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方面取得进步或未能取得进步，其成败有多大，又是怎样形成的。因此，多数论文是将文化聚焦为一个独立的或说明性的变量，即自变量。然而，如果说文化因素确实影响人类进步，有时又阻碍这一进步，那么，我们也就关心作为一个非独立因素即因变量的文化，这就是探讨莫伊尼汉指出的第二个真理：政治行动或其他行动如何能改变或消除文化对于进步的障碍？我们知道，经济发展会使文化改变，但这一道理无助于我们达到上述的目的，即消除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障碍。社会经受重大创伤之后也可能相应地改变其文化。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灾难经历，使这两个世界上最军国主义的国家变成了两个最和平主义的国家。同样，马里亚诺·格龙多纳在他的文章中指出，阿根廷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走向经济改革、经济稳定和政治民主，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惨痛地经历过粗暴的军事独裁、战争失败以及超高通货膨胀。

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一国的政治领导者能否促进文化变革，以取代灾难。在某些情况下政治领导者可以做到这一点，新加坡即是一例。正如本书中由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和加布里埃尔·萨曼·伦兹合写的一章所强调指出的那样，腐败的程度往往是沿着文化界线而变更。最腐败的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俄罗斯以及若干拉美国家和非洲社会。在北欧和前英国殖民地的一些新教社会，腐败程度最低。儒学社会大都居于中间。但有一个儒学社会，即新加坡，却是与丹麦、瑞典、芬兰和新西兰一样，并列为世界上腐败问题最轻的国家。这一反常现象的原因显然就在于李光耀决心使新加坡成为尽可能无腐败的国家，而且成功了。这正是“政治改变了文化，使之免于沉沦”。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李光耀不再当政以后，无腐败的新加坡能保持多久？政治能永远使社会“免于沉沦”吗？政治行动和社会行动如何能使文化变得更有利进步，这是我们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探讨的中心问题。

“文化价值观与人类进步”研究课题以及本书首先应归功于劳伦斯·哈里森，是他的想法、毅力和献身精神的成果。他构思了这一课题，列出了要涵盖的题材，延聘了各专题小组的成员，编辑了他们的文稿，并为了做到这一切而筹措了